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13
(第 12 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2)

中农的日常生活(1953—1956)
——统购统销制度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张晓玲

(内蒙古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 要:1953—1956 年中农的日常生活表明:给国家工业化强有力支撑的统购统销,引起了不少农民尤其是广大中农的不满。统购统销给他们带来的是饥肠辘辘的深刻记忆。在此基础上,虽然广大中农向国家权力机构表达了其意愿,并以多种方式抗争,但最终大都无奈地选择了俯首帖耳。

关键词:中农;日常生活;统购统销;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0202(2013)01 - 0151 - 06

不论是土改中抑或土改后,中农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阶层。中共中农政策亦历经多次调整。这不仅因为中农在人口、土地占有上有绝对优势,还在于中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统购统销是中国政府于 1953 年开始实施的为满足国家迅速工业化目标而采取的以低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如今,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远去,但它留给那几代人的记忆却是深刻的。迄今为止,就统购统销的研究现状而言,成果不少①。然而,该制度下农民的心理感受和行为方式等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却较少有人谈及②。马克思曾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统购统销制度下中农的感受及日常生活折射着国家权力的痕迹,制度影响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农民日常生活是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分析框架来认识国家政策以及农村变迁和发展,能够摆脱传统学术研究"重国家、轻农民"的研究范式。全面认识 1953—1956 年统购统销制度下中农的日常生活状况,对于我们理解统购统销制度,特别是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

一、饥肠辘辘的历史记忆

考察历史事件不应该忽视底层历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历史是最重要的。本文的基本切入点是中农对于统购统销制度的反映及该制度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后果。统购

收稿日期:2012 - 06 - 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JL008)

作者简介:张晓玲(1984—),女,山西忻州人,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① 参见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与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② 据笔者管见,目前就统购统销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作专门论述的有雷颐和田锡全。(见雷颐:《"日常生活"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3 期;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1953 - 1957)》,复旦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雷颐的研究主要侧重对票证制度的定性描述,田锡全则加入关于唐河县定量分析的内容。因为统购统销给予中农及各阶层农民生活的影响以及各阶层对统购统销的反应,在程度上各不相同,所以统购统销的开始实施便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或原有社会关系的继续深化。

统销一开始实施,就有不少农民都表示不满,但"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2]295因此,文中涉及到的农民一般均为中农。

统购统销留给农民最深的记忆恐怕用"饿"字形容最为恰当,而这一深刻记忆用"国家主导"的分析框架似乎难以进行有效解释,这就促使我们从农民的日常言语中去寻找统购统销下农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1953 年,因多数地区口粮留量太少,很多农民怨气冲天,对统购表示出强烈不满。湖北孝感县大陈乡农民反映:"共产党好,就是不让农民吃饱不好"。麻城四山乡农民对供应紧张这样说:"统购说四留是神圣不可侵犯,是命根子,今年命根子也搞掉了。"浠水县望城乡农民说:"统购就是叫农民苦过日子,节约就是叫你饿肚子。"[3]112该乡的富裕中农郭少怀,对 1953 年秋国家实行的统购大为不满。他说:"原来看共产党还不错,现在越看越不像话。"[4]广东新会县农民见到干部就说:"饿呀同志,冷呀同志。""辛苦一年没得吃。""现在政府不知怎样,共产党要整死人。""共产党变了脸。"高要县农民反映:"年年有购粮,以后日子怎么过。"农民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新会、台山、中山等地农民甚至说:"共产党不准吃晏(午饭)",弄得很多人不敢吃午饭[2]291。1957 年杜导正等人关于对高要县龙冲乡 15 户农民进行专访的材料显示:"无论上中农、下中农、贫农,只要提起这件事(指统购统销),没有一个不批评我们的。所不同的,只是看法不同,不高兴的程度不同。上中农粮食宽裕惯了,这时特别受不了,不满程度最大。下中农不满统购统销买走口粮。贫农赞成统购统销,说粮食供应有了保证,粮价不会波动,但不赞成统销过紧的做法,说'口粮也买不回来'。他们说共产党的政治有两条不好:'一是 1955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统得太紧太死不好;二是现在,口粮有保证,但是'手头不活动'。"[5]

在广西,统购统销过程中余粮购不足,购到了口粮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下中农和贫农余粮不够,还得从口粮中拿。群众曾这样反映说:"统购瞎摸底,没有也要购。"[3]320一老上中农认为:"有粮不如在手中。"[3]261有的中农说:"我经历过皇帝见过官,就没见共产党这样管粮食","共产党多事,粮食还用管,谁粮食多了不知卖","统购统销走形式结果都不自由","国民党不好,粮油随便买,共产党好,吃过头粮,三两油。"还有"共同享福,种田不见谷","毛泽东,米缸空"等类的顺口溜[2]721。

在江西,多数新老上中农对统购统销的标准有抵触,叫喊不够吃,感到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使自己用粮不方便。如丰城县爱国乡上中农胡林福说:"解放前怕五百钱(点穴),解放后怕五百斤(口粮)。"[3]193有的干脆囤积不卖,把粮藏在夹墙中或缸瓮中说:"政府统购硬缺德","铜钩(统购)铁钩都钩不出我的粮食去","你有几多粮,政府就有几大仓"。富农对统购统销一般都有抵抗情绪,生产消极。如九江县石门乡富农吴火生说:"种田累得要死,还吃不饱饭,种他娘的头。"[3]194赣县吉埠乡一富农老婆还假装饿死睡在田野说:"没粮吃,快饿死了,他们做事缺了德,连口粮也购了。"[3]195

在河南,平舆县射桥镇的农民在统购后反映说:"做啥?做出来也不得吃,做出粮食还有罪,还不胜人家二流子哩,吃吃喝喝,临了还不卖粮,也不受罪!""劳动好,打的粮食多成了罪人,人没吃,牲口无料,生产干啥?产的多,要的多,不如不产不罗嗦!"唐河县有的农民说:"你做的多,将来卖的多,卖完了,还是饿着肚子,不胜休息一会。"[6]

在山西,群众普遍反映口粮留量太少。据 1954 年 20 乡的调查统计,口粮留量最高的是 379 斤,如解虞县王村等 3 个乡。最低是 202 斤半,如兴县冯乐乡、平顺县官洞水乡等。平均水平是 300 斤,比 1952 年实际用的口粮(如潞安县鹿家庄 440 斤,隰县蓬门 470 斤,阳高县友宰 420 斤,兴县王家庄 330 斤)低约 115 斤。按最高 379 斤计算,1 人每天平均吃 1.04 斤粗粮,而按平均 300 斤计算,1 人每天平均只吃 0.82 斤。如果按最低的 202 斤半计算,1 人每天平均只吃 0.55 斤粗粮食。

这个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群众都说:“口粮留在算盘上。”[3]13

在湖南,不少中农存在某些紧张心理和不满情绪。中农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普遍反映是:“口粮留的太少,喂猪又没有饲料,生产冒得搞手。”一见干部就装个可怜相。如中农王美成见干部到他家去,就故意拿夏菇菜做粑粑吃,说他在吃草,问干部:“现在大肚子好呢还是小肚子好? 政府号召增产,小肚子怎么做得事?”特别是富裕中农一讲起统购就放高嗓子谈论他“过去多过的好,统购以来连猪也喂不成了。”[3]148

以上例子反映出统购统销制度下大多数中农的真实生活状态。不能否认土改以后土地私有权的确立为农民带来了诸多权利,极大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对于大多数中农家庭而言,国家为农民创造的市场关系给他们造成了不断严重的压力。过高的征购比例和不足的供应以及低廉的农产品统购价格,不仅压抑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他们向国家出售农产品的热情。据山西 20 乡的调查统计,1954 比 1953 年减产 12. 25% ,统购数却增多 41. 2% 。在具体做法上,有的乡是一味加成。如兴县王家庄一直加到 4 成,把余粮户计算成占全乡户数的 94% ,统购后却出现了 80 户透底户。有的乡是极力压低留量。如兴县冯乐乡及平顺管洞水乡,口粮竟压至 202 斤半[3]13。又如在热河承德县三区上台子村,由于 1954 年购粮任务增加,购了一部分农民的口粮、畜料,导致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生产情绪极为不稳定。有的人认为日子不好过,多打了粮食自己也吃不着;有的户缩小生产投资,扩大生活消费;有的农户怕没吃的不供应,成天喊“不够吃”,不积极从事生产;有的甚至卖掉耕畜,以表示不满[7]。很显然,从 1953 年开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尤其是与中农的关系并不好。国家建立排他性的销售渠道取代了市场力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8]26处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间地位的中农,虽然能够参与村里的一些事务决策,对于国家权力亦表示了诸多不满,“人并不总是一声不响地饿死”,但农民对国家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口舌之战,基本上农民最终都无奈的成为国家权力俯首帖耳的受众。国家过分强大和农民过分弱小、国家的体制化与农民的分散性导致农民通常不能成功争取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对国家发生某种影响。有学者认为土改后到 1958 年初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奇地好,并把这一时期称为国家与农民的第一次蜜月[9],但是统购统销制度下中农的日常生活表明这一段时期,至少从 1953 年开始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用蜜月来形容并不恰当。虽然统购统销政策受到部分贫农的拥护,但这一政策从一开始就导致多数中农的不满。特别是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以中农为主体的多数农民已经出现了抵触情绪,尤其是随着征购比例的提高,国家的强制力表现非常。如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绑了八、九人,竟将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捆起来,由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秤粮食,不卖的就当场绑起(绑了二人)[2]292。部分地区农民开始抗争。1954 年广东省因购粮而自杀者 111 人[2]292。不难看出,农民的反抗有着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口舌之争,或者是消极生产,或者是宰杀牲畜,以及个别激烈的自杀事件等。然而,即便如此,顺从和遵循仍是农民公开的姿态。

二、合理化剥削——剪刀差下的农民生活

统购统销制度除通过直接的征购影响农民日常生活,还利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对农民进行隐性的合理化剥削。建国初期,为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缩小工农业价格剪刀差,中国政府曾多次提高农产品价格。总体来看,1950—1956 年工农业的价格剪刀差有所缩小。1950—1952 年农产品价格均有不小幅度的增长,剪刀差有较大程度的缩小。然而,自 1953 年实行统购,取消了季节差价,1953—1956 年粮食类价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因此,1953—1956 年粮食类的剪刀差缩小幅度最小,剪刀差仍然偏大,价格偏低。特别是 1955 年的剪刀差还有所扩大。1955 年同 1954 年相比,

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0.7%,农村工商业品价格却提高了1.74%[10]。

较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不少地区都有具体表现。如在湖北,谷城县粟谷区1953年每斗芝麻换油9斤4两,1955年换8斤4两。1953年每斗菜籽换油5斤3两,1955年换4斤2两。1953年每斗漆子换油2斤5两,1955年换1斤5两。麻城四川乡棉籽与棉饼的历史比价是9:1,1954年是17:1。孝感县太子乡1953年黄豆每担10元,豆饼每担9.2元;1954年黄豆每担8.7元,豆饼每担9.8元。孝感县大陈乡抗战前每百斤稻谷可换豆饼87斤,1954年只能换63斤,减少24斤[3]107。

显而易见,在建国初的五、六年当中,国家使用压低农产品价格和工农业剪刀差的做法对农民进行了合理化的剥削。在此情景中,农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对这一做法呢?多数农民对于这种剥削并非毫不知情,毫无反应。如在山西,1954年统购后阳高县下深井乡供应的代食品价格是:1斤豆饼9分,1斤干山药2角。农民一提起统购就生气地说:"卖了1斤4两豆子,换回1斤豆饼","卖了3斤谷子,换回1斤干山药","一折腾,粮食变成了代食品,钱也折腾的没有了。"[3]14在湖北,农民则通过消极生产的方式进行反抗。如过去农民摘漆子很过细,生怕把树枝攀断了,现在把大树枝扯掉也不可惜。有些农民漆树在门口,漆子熟了也不摘[3]108。显然,对于这种合理性的剥削,农民以低姿态的形式进行了反抗。然而,国家较大的权力和农民较弱的力量决定了农民反抗的效果通常是微弱的。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11]。但即便如此,国家至少也会做出一些让步。1955年,中共提出在统购统销问题上,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可能[2]296。这是农民表达诉求和追求利益的结果。

三、农民副业大幅减少

统购统销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副业方面。1953年统购统销开始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农及其他阶层的副业收入大幅减少。据湖北省9乡调查,1954年农村副业收入比1953年减少26%。其中,老中农的减少幅度最大,1954年比1953年减少44%。其次为新中农,减少21%。再次为富农,减少33%。最后是贫农,减少27%[3]112。如广东省高要县龙冲乡的下中农抱怨统购统销把他们的养猪养鸡副业统掉了[5]。又据山西20乡的调查统计,1954年山西省的养猪户大幅下降,拥有猪的头数也急剧下降。如1955年阳高县下深井的猪就由1954年的140头下降为20头[3]13。1954年潞安县鹿家庄给驴的留料是360斤,实际需要500斤。给牛的留料是240斤,实际需要300斤。给骡马留料是700斤,也是不足。牲口留料既低,又因口粮不足人吃了留给牲口的饲料,如榆次县福堂村8户就吃掉1200斤饲料。由于饲料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耕畜的体质和耕作。福堂村星火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因为耕畜体弱,不仅将每犋每天耕地的标准由5亩、4亩半、4亩降为4亩2分、4亩、3亩8分,而且在种麦的时候,40头耕畜就有4头不能上地。耕畜留料如此,幼畜多不留料,这极大地影响幼畜的生长。农民喊叫:"小牲口不叫(让)吃料,也长不大呀!"[3]13再如湖北省黄冈县群力第三农业社,79户富裕中农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抱有抵触情绪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和堵死了他们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12]1953年国家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以及相伴随的农业合作化极大地限制了富裕中农的商业和副业活动。

副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统购统销的实施。以养猪为例。养猪是农民副业的一个重要项目。养猪不仅可以获得一定收入,还可获得肥料。因此,在中国农村素有"富人不离书,穷人不离猪"之说。由此可见,养猪对于农民生活的重大意义。养猪户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饲料不足。如湖北当阳县胡场乡富裕中农冯有根说:"往年喂猪至少一石大麦(合180斤),现在顶多80斤,怎么能喂肥呢?"又据恩施滴水乡的调查,1954年全乡因没饲料,提早杀猪有

300 头。中农钱金培喂 7 头猪曾用棒子打死一头。清水乡新中农陈云贵把一头 28 斤的小猪杀了,他说:“只当杀一个鸡子吃。”[3]113 又如在江西九江县石门乡新老上中农和富裕中农 1953 年每头毛猪喂粮食(一般是红薯和芋头)180 斤,一般户 120 斤,较困难的贫困农民也要 80 斤。1954 年比 1953 年有了减少,最多每头 110 斤,一般的 60 斤,最少的每头 20 - 30 斤[3]193。

其次,猪的销路不好。1954 年春湖北出现了养猪卖不出去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如当阳县胡场乡的小猪送人没人要,这就使得喂养母猪的农民大大减少。据 1954 年湖北 9 乡的调查,1955 年母猪比 1954 年减少 20%[3]113。

再次,价格因素。据湖南 9 乡的调查,1955 年仔猪价格每斤超过肉猪价 4 倍左右,超过架子猪价 5 倍左右[3]119,使得农民感到无利可图。价格下跌还进一步导致各地发生农民大量杀猪的现象。如 1954 年 12 月下旬,广东省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 70 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旧币 60 万元到 100 万元 1 担的正常价格降至旧币 14 万元 1 担。潮安县九区一天即杀母猪 40 多头,普宁县曾发现用一只大母鸡换两个小猪,旧币 0.9 万元卖一只 20 斤重的小猪。台山县有一农户把刚生下的 10 个小猪全部弄死。揭阳县也发现有个别农民把小猪淹死[13]。

统购统销对副业的影响涉及到的主要是中农。统购统销制度出台以后,严禁私人从事农产品的购销活动,一切均由供销社来进行。极大地限制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商业活动,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生活,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陈云曾说,“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有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14] 毛泽东在 1960 年也曾说过:“50 年代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有两次同农民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一次就是 1953 年。”[14]1953—1955 年两个年度的统购出现了许多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等现象,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了,所剩无几,更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诺思曾指出,“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设计产权,普遍趋势就是产生低效率的产权,从而不能达到持续增长。”[8]28 统购统销不仅使农民失去了吃饱的权利,也使其丧失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权利。农民的日常生活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在推进时的力量非常强大,其影响涉及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统购统销制度推进过程中,农民的日常生活被严重干扰。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紧张也充满了微妙,国家虽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农民却使用言语表达、消极怠工、宰杀牲畜等低姿态的“弱者的武器”与国家进行抗争。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农民选择了无奈的遵从。

四、结　语

中农的感受和日常生活折射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渗透。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使其岁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这个社会,整个农民阶层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曾这样说过:“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15]1980 年代取消统购统销时,国家称之为为农民“松绑”。统购统销还把农民强有力地推向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因为在已经组成农业合作社的地区,地方干部在对政治压力作出反应时从农民那里榨取更多粮食的能力最大。在这些地区的干部,可以简单地留下更多粮食上缴国家,而不必与个体农民生产者就他们被要求交纳粮食的数量进行商讨[16]。于是,为了完成统购任务,不少农民被迫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通过考察统购统销制度下中农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们怨气

冲天的言语表达以及谨慎的行动表现了其对统购统销制度的反感和抗争。在农村,不少农民在政治上也较为活跃。他们会以多种方式为自身利益进行抗争。显然,在国家权力之下,农民并不是完全沉默的个体。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最终无奈地选择了俯首帖耳。总体来看,中农对于统购统销的言语表达有显著的一致性。他们的抗争与自身阶级的经济利益密切联系。对于国家而言,农民的感受和日常生活状态尤为重要,是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统购统销制度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其折射出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2]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3] 八个省土地改革结束后至1954年的农村典型调查[B]. 1958,山西省档案馆,21-8-1-2.
[4] 湖北省三个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调查[N]. 人民日报,1955-10-14.
[5] 龙冲乡农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N]. 人民日报,1957-4-6.
[6] 田锡全.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唐河县的运作(1953-1957)[D]. 复旦大学,2004.
[7] 中共热河省委农村工作部. 1954热河省农村调查汇集[B]. 1955,河北省档案馆,C832-23-1-1.
[8] 诺 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 曹树基. 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J]. 读书,2002,(7).
[10]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1957年商业统计资料汇编(各种物价指数与主要商品价格统计表)[B],1958:24.
[11] [美]詹姆斯斯·C. 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序言2.
[12] 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N]. 人民日报,1957-11-28.
[13] 高化民.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156.
[1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91.
[15] 刘少奇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1-442.
[16] 强远淦,林邦光. 试论1955年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J]. 党史研究,1981,(1).

Everyday Life of Middle Peasants from 1953 to 1956 ——on the Relation of Nation and Peasants in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ZHANG Xiao-ling

(*Economics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o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Past studies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had been mainly concentrated on policy and effect, ignoring the mentality , everyday life of middle peasants and the interactions with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The everyday life of middle peasants from 1953 to 1956 shows that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giving rise to dissatisfaction. It gave people the profound memory of hunger. Although all middle peasants expressed their will to nation and struggled in many ways, they had to prefer amenability in the end.

Key Words: middle peasants; everyday life;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rural economics